

499

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

刘耿生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刘耿生编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ISBN 7-300-03660-0/G·754

I. 档...

II. 刘...

III. 档案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G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682 号

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

刘耿生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刷厂

开本: 787×980 毫米 1/16 印张: 25.75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68 000

定价: 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本书是“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之一，可作为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学习档案学专业课程的教程。

人类自从有了文字、出现了档案，就试图开发和利用它，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尽管我们今日所能开发和利用的档案原件，绝大多数是明清以降的产物，其可见之史虽短，其可溯之源甚长。因为古往今来，人们所有的努力奋斗，无一不是在以史为鉴，鉴往知来，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现实行动的准绳。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展开的历史。历史在不停地发展，叱咤风云的英雄，惊天动地的事业，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历史不能重演，它不能像化学反应那样在试验室内反复实验。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只能产生一次，一旦过去，即消失在漫漫的历史夜空中，后人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年代身临其境地对当时的历史进行考察和研究。可是，历史却给后人留下了原始记录——档案：档案真实地记载了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世间刻骨铭心的慷慨悲歌，我们可以通过档案等文献来认识和研究过去，这是历史对我们的厚爱。

档案是人们在各种实践活动及思维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历史记录。由于它不是人们事后的有意识创作，因此，一般说来，其内容比较真实，誉者不过其实，抑

者不损其真。由于档案的真实可靠程度要高于其他种类的文献，因此当某人或某事在不同的文献中记载各异时，多以档案原件记载为准。档案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在各种文献中居于首位，这是我们应大力开发和利用档案的主要原因。

求得真实可靠的档案，是人类认识自身历史不可超越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史学。从事史学研究，就要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述评，使人们从中受到启示，进而掌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更自觉地创造历史。档案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的成果。只有在真实、丰富的档案文献基础上，才能构筑起雄伟辉煌的史学殿堂。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必须以档案为历史研究的基点，忠于档案，忠于史实，才能写出“资治当今，垂范后世”的史著。这是必须大力开发和利用档案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开发档案文献资源的手段很多，最基本的措施是对档案收集、分类、立卷、排列、编目、鉴定、编制检索工具以及进行统计等等，是谓对档案的“第一次整理”，这是档案馆（室）的基础工作。档案管理学就专门研究“第一次整理”的理论与方法。开展档案文献编纂公布，则是根据一定的专题，在有关的档案部门内查选档案，经过严格的编辑加工，以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布档案内容，这属于对档案的“第二次整理”。两次整理的共同目的都是方便读者开发利用档案文献资源，并加强对档案原件的保护。但是，“第二次整理”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围绕某一题目编纂档案文献，可以由以前档案馆（室）“你来我调”的被动性服务，转变为将档案原件编纂成各种形式的档案文献出版物，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成为主动性服务：提供给读者，使广大读者不用到档案部门调阅原件，即可以获得某一专题系统的、完整的和科学的档案信息内容，免去读者因查阅档案原件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便。“第二次整理”的各个环节都是完整的学术性活动，同时它又与许多相关学科发生着密切联系，因而，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档案整理的高级阶段，对于档案的开发和利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今后开发利用档案文献资源，克服在利用档案方面的诸多不方便因素的有效措施，尤其是使开发利用档案工作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重要途径，亦是本教程的重点内容之一。

人是文化的载体，档案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产物，人类自身的弱点也往往对档案造成不良影响，致使许多档案存在“失真”（伪造、篡改）、“失实”（内容记载错误）、“失时”（无形成时间或时间不确、不全）和“失辨”（文字上的讹舛）等状况，存在上述情况的档案统称为“伪误档案”。伪误档案的出现，严重地妨碍了对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因而在开发利用档案的同时，必须鉴定其真伪，辨别其正误。对档案的鉴别工作，是开发利用档案文献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发利用档案的必要措施。

档案鉴别的主要内容，系针对档案中出现的真赝杂厕、诸多歧异的现象，以历史的观点审查伪误档案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总结前人鉴别档案文献的业绩和成果，特别是近、现代史家在绚丽多彩的档案鉴别活动中形成的经验及其得出的结论；依据档案的外形、内容是否存在矛盾，以确定其真伪正误；确定档案文献版本源流及其异同优劣和档案赝品分类的科学方法；判定档案形成的准确时间等等。

敢于怀疑，则伪误因此订正；志在求真，则成见方能否定。鉴别档案的直接目的，是在开发利用档案时，保证档案的可据性和可读性。档案的可据性，指其本身和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档案的可读性，则指其内容能够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并能够方便地开发利用它。保证其可据性和可读性，都必须通过对档案进行鉴别才能实现。经过鉴别，证实某档案为伪误，说明它已经失去了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没有开发利用的价值；而内容艰深难懂的档案，如甲骨文档案，或字迹极为潦草的日记、信函、账簿，以及勾改杂乱的手稿、札记等等，或不分段、无标点的历史档案，虽然是真品，但今日读者很难辨识阅读，也就难以去开发利用它，其可据性自然也要受到影响。总之，档案的可据性和可读性决定了其是否具有开发利用价值，而鉴别档案是保证其具有可据性及可读性的主要手段，因而这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本书的又一个重点。

开发利用档案的形式很多，其最高形式是编史修志。治档与治史二者历来密不可分，先秦文、献不分，两汉经、史不分，古代的档案与史书混为一体。唐代刘知幾从理论上将档案从史书中区分出来，从而确立了档案的独立地位。此后，我国逐渐形成前朝治档，后朝治史；前人治档，后人治史；前半生治档，后半生治史的优良传统。因此，我国编史修志硕果累累，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名人有传。编史修志中的修史和立传属于历史学范畴，本书存而不论。回忆录、地方志和谱牒，则是兼有档案和史著性质的特殊的档案文献。回忆录是当事者（即回忆录作者）将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历史，以大脑为载体，形成口碑档案，再转录成文字等材料的一种档案文献；地方志是将某一地域有关自然风貌和人文历史的档案文献，以一定体例分类编写的档案资料书；谱牒是记载家族人物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这三者的形成，是利用档案编史修志的产物，是治档与治史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档案文献，是开发利用档案的最高形式之一。

对回忆录、地方志和谱牒这三种档案文献，也存在一个开发利用的问题。它们对于历史研究、发展经济、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意义巨大，但是，以前对它们的认识不够，缺乏研究，因而在开发利用上尚有广阔空间，有待我们今后去努力挖

掘、利用，这对于加强学科建设大有裨益。

回忆录、地方志和谱牒的撰修程序，主要是采用修史的方法，同时还利用档案文献编纂和鉴辨的方法，前者不属于档案学内容，后者在本书前两编中已作论述，因而在第三编中未另辟章节专作介绍。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赵福琪、刘仰东、陈泽春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他们对本书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因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谨识

2000年9月4日



目 录

第一编	开发利用档案的重要途径——编纂公布	1
第一章	档案文献	3
第一节	“档案”溯源	3
第二节	档案的知识属性	11
第三节	档案与历史研究	16
第二章	档案文献编纂	22
第一节	档案文献编纂与档案文献编纂学	22
第二节	开发利用档案的途径与措施	28
第三节	档案文献编纂的性质与原则	29
第三章	档案文献的选择	31
第一节	编纂选题	31
第二节	档案文献的查找	42
第三节	档案文献的挑选	61
第四节	档案文献的选本	76
第五节	选材的方法与步骤	79

第四章	档案文献的编辑	82
第一节	档案文献加工工作概述	82
第二节	档案文献的转录加工	87
第三节	档案文献的点校加工	98
第四节	档案文献的标题	108
第五节	档案文献的编排	117
第五章	档案文献编纂中辅文的撰写	129
第一节	评述性材料的撰写	129
第二节	查考性材料的撰写	164
第三节	检索性材料的撰写	185
第二编	开发利用档案的必要措施——鉴辨真伪	205
第六章	伪误档案	207
第一节	伪误档案产生的原因	207
第二节	伪误档案之恶劣作用	225
第七章	档案文献鉴辨的三次高潮	240
第一节	清朝以前档案文献鉴辨简述	240
第二节	档案文献鉴辨的第一次高潮——乾嘉时期	257
第三节	档案文献鉴辨的第二次高潮——清末民初	264
第四节	档案文献鉴辨的第三次高潮——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286
第八章	档案文献鉴辨的原则与方法	306
第一节	档案文献鉴辨的原则	306
第二节	档案文献外形鉴辨	313
第三节	档案文献内容鉴辨	319
第四节	档案形成时间鉴辨	326
第三编	开发利用档案的最高形式——编史修志	329
第九章	回忆录的开发利用	331
第一节	回忆录的开发利用价值	331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回忆录	335
第三节	开发利用回忆录应注意的问题	343
第十章	地方志的开发利用	353
第一节	地方志概论	353

第二节	地方志的起源与演变	361
第三节	修志的全盛时期	368
第四节	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	377
第十一章	谱牒的开发利用	384
第一节	谱牒概论	384
第二节	谱牒的体例与内容	393
第三节	清代玉牒	400

第一编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开发利用档案 的重要途径 ——编纂公布





第一章

档案文献

第一节 “档案”溯源

一、清以前对档案的称呼

清代以前，汉字里并没有“档案”一词，对“档案”这一概念的称呼五花八门。

商朝称之为“册”或“典”。《尚书·多士》中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之句，是说周公旦讲，殷人曾有记载汤革夏命的“册”、“典”等。这大约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出现的档案概念。

西周将档案称为“简牍”或“简策”。《礼记·中庸》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的记载，是说周文王、周武王时代，他们的政绩记载在竹木上。

对于“牍”和“策”的区别，晋代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讲，春秋时的档案是“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唐代孔颖达注：“一扎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由此可见，“简”是竹片，仅写一行字；“牍”是木板，因木板宽，可并容数行；“策”同“册”，则是将它们连编成册，是谓“简牍”、“简策”。简与策用于记载国家重

大政事和书写典籍，牍主要用于一般公文书。这些含义，直传至今。

先秦不分档案和著述，统称为“书”。

秦汉时称档案为“典籍”、“图籍”。东汉蔡伦发明造纸后，人们称纸张档案为“文书”、“公文”。《汉书·刑法志》上有“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记载。

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代，人们逐渐将档案和著述分开，而称档案为“文卷”、“文案”、“案卷”、“案牍”、“文牍”、“簿书”等等。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中有佳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李商隐在《筹笔驿》中亦有“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的诗句，为唐代将档案称为“案牍”、“简书”提供了例证。

此后直至明代，才逐渐称档案为“案卷”，此词沿用至今，乃档案的专用名词。

迄今为止，在我国古籍文献中，尚未发现清代以前出现过“档案”一词。而现代概念的“档案馆”、“档案库房”等称呼，清以前亦无。凡存放公文、典籍、史册、案卷、谱牒之类的库房，另有其他称呼。周代称“天府”，汉代称“兰台”、“东观”，唐代称“史馆”，宋、元称“架阁库”，明、清称“皇史宬”。

二、“档”字含义

在《康熙字典》中，“档”字按宋人王洙等所编纂的《类编》，解释为“横木框档”，意思是：用有框格的木架为工具，以存储各种书契，一格称为一档。汉文的“档”字在古代并没有“文字记载”或“史实记录”的含义，更未和“案”字组成一个词。

有趣的是，清入关前满文中的“档”字，已经含有现代“档案”一词的意义了。据满文档案记载，至迟在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年），满文中已有“档子”的发音。后来创设了满文，写作 ᡳᡳᡳᡳᡳᡳ ，其罗马字母读音为 Dangse，该字的汉字标准注音为“达阿昂塞额”，快读即“档色”之音。凡汉语中词尾一字为“子”者，满语均作 Se（色），因而，“档色”即“档子”。其满文含义为：“役所往来文书”和“衙府所存公文”。可以理解为，满文“档子”就是今日的“档案”。清入关后，保存档案的库房称为“档房”。如内阁的“档房”，内务府的“黄档房”，掌仪司和都虞司的“西档房”、“东档房”，内务府昇平署和内务府堂中的“档案房”等等。

不少学者曾经考证满文“档子”是否就是“档案”，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结论。

近代史家曹宗儒在《满文本牌及满文老档》中，对“档子”的解释为：

形式上，“牌子”及“档子”似一类，内容则异。“牌子”性质属往来传

递，“档子”之性质，则属于记载。^①

曹宗儒的理解是：满族在关外生活时，使用的木质“牌子”和木质“档子”在外形上相同，上面皆有文字，但文字内容不同，“牌子”用于“往来传递”，而“档子”用于记载。可见，清入关前的“档子”已如今日“档案”。

已故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在《清初开国史料考·二》中认为：“所谓‘档’字者，即记录档册之意义也。”他的结论比曹宗儒先生又进了一步，肯定了满文“档子”就是“记录档册之意义”，即现代意义的“档案”。

满文的“档子”就是汉文的“档案”，在《红楼梦》中可以找到例证。曹雪芹隶属汉军旗，懂得满文，他在书中多次使用“档子”一词：

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贾蓉进来向尤氏道：“礼单都上了档子了。”书中对“档子”的注释为：“档子——档案，记录账簿。”^②

第九十三回“水月庵掀翻风月案”中，王夫人在处理贾芹和水月庵小女尼女道士拈花惹草一案时说：“也说给账房儿里，把这一项钱粮档子销了。”这“钱粮档子”自然指的就是现在所谓的“薪水档案”了。^③

第一〇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后，贾政分析致祸原因时说：

“如今大老爷和你珍大爷的事，说是咱们家人鲍二吵嚷的，我看这册子上并没有什么鲍二，这是怎么说？”众人曰道：“这鲍二是不在档子上的，生前在宁府册上。”^④

这里说的“档子”，显然是今天的人事档案一类的东西，而且在贾府中人事档案已经有了“册子”。

《红楼梦》写于清乾隆年间，对满文的“档子”（就是汉文的“档案”）提供了难得的佐证。

三、“案”字含义

汉字中“案”的含义，包括“案记”、“案牒”、“案牒”、“案帙”、“案籍”等内容，涉及公文、典籍、史料、卷宗等方面。《唐书·百官志》云：“掌言二人……录所奏为案记。”《唐书·李抱真传》还有“岁终大校（习射），亲案籍，第能否掌责”等语。《后汉书·卢植传》云：“植献书规之曰：‘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宋史·刘恕传》云：“恕为学，自历数、地理、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牒，皆取以审正。”明代张成烈在《正字通》中说：“凡官府兴除成例，及狱讼论定者，皆曰案。”在古代汉语中，凡保存起来为案据的文书，

^① 《大公报》，1937-07-01，“图书副刊”。

^{②③④} 曹雪芹：《红楼梦》，121、1104、12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皆称为“文案”和“案卷”。

四、“档案”一词的诞生

清王朝建立后，人们逐渐将满文的“档”和汉文的“案”结合在一起，所以，“档案”一词是清代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从现存档案看，“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月汉文正本《起居注册》中。

上问：“马哈喇之父、叔阵没，本身亦有功牌，其罪如何？”大学士明珠奏曰：“马哈喇之父、叔阵没，皆系松山等处事，部中无档案，故控告部议不准。”^①

这里意思是说马哈喇的父亲和叔公阵亡了，但未见档案记载。《起居注册》记录帝王生活言行，是类似日记性质的档案。能在帝王日记中出现“档案”一词，说明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这个词汇了。

对“档案”一词来源有正式记载并作出解释的，当推杨宾大约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写成的《柳边纪略》。杨宾，字可师，号耕夫，别号大瓢，又号小铁，浙江山阴人，生于顺治七年（1650年），能诗善画，性嗜著述。其父杨安诚，为友人事受到牵连，被充军驻防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杨宾到京师为父讼冤，康熙帝看他诚恳，讲话实在，有道理，于是颁旨允许他到柳条边外，迎父归乡养老。这个柳条边，是清朝在关外修筑的一条柳条篱笆，作为边墙，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放牧。杨宾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到柳条边外宁古塔驻军营地省父，他利用此机会顺路考察，写下《柳边纪略》一书。该书共五卷，记述了清初盛京（沈阳）、宁古塔、瑗珲三将军所辖地区，即柳条边外的形势、山川、官制、兵额、城堡、驿站、部落、寺庙、贡赋、物产、民情、风俗等等，是研究清初东北满族居住区社会及自然情况的珍贵资料。杨宾在此书中三次提到“档案”一词，在《柳边纪略》卷3记有：

山海关……额曰天下第一关……进关者如出时，记有档案。

边外驿站，相去远近不一……每站设笔帖式一，俗呼帮识，拨什库一。

拨什库专司应付，笔帖式登记档案。

文中提到的“笔帖式”、“拨什库”为清代秘书一类的小官。尤其珍贵的是，杨宾在此还专门对“档案”一词作了解释，认为“档案”是从“档子”进化而来的：

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

^①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1版，6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犹之中土文字。汉以前载竹简，故曰简，以韦编贯，故曰编。今之人既书于纸，为卷为部，而犹呼之为编为简也。

杨宾讲得很清楚，居住在东北的满族，在木板上书写，用以传递的木板叫“牌子”，牌子积累多了，用皮条贯穿，挂在墙上，形状像木档子，因而叫“档子”，有如中原汉族的文字。汉代发明纸张以前，将文字写在竹简上，称为“简”，以皮条编贯，称为“编”，现在写在纸张上，称为“卷”、“部”，和“编”、“简”是一个意思。这是迄今为止知道的对“档案”一词的最早解释。曹宗儒先生即沿用了杨宾这一说法。

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木牌档案，证实了杨宾的记述：满族在努尔哈赤以前，没有自己的文字，“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始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以蒙古文字母和女真语拼成满文，这便是老满文，亦称无圈点满文。皇太极时命达海等人，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增加圈点，并创制十二字头和专记外字符号，成为有圈点的新满文。“档子”（)即为有圈点的新满文。

满族早期的文书是写在木牌上的。如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木牌档案《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26块，内容记载杀敌、俘虏及掠夺战利品等事。木牌以白木为之，不加涂饰，长达尺余，短的仅数寸，宽狭大约一寸左右，牌之下方，有一小孔，四五片为一组，贯以皮条或麻绳。这种木牌使用较久，直到清入关后，顺治二年（1645年）才下令“各衙门奏事，俱缮本章，不许复用木签。”从此，在清代档案中，才一律用纸张书写，而在关外民间，则仍存在木牌档案，不过在逐渐减少。因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木牌档案，弥足珍贵。

综上所述，“档案”一词产生于康熙时代。由于它是人们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新词汇，因而传播很快。到了雍正朝，“档案”一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且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十四中记载的雍正七年（1729年）上谕：

内阁本章及各衙门档案，皆应于正本外立一副本，另行收贮……嗣后各部门存贮档案之处，应委笔帖式（相当文书官吏）等官，轮班值宿巡查。

此处提到的“档案”，已经和今日“档案”的含义完全一致了。

五、“档案”词义

（一）“档案”定义

清朝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年—1801年）在《文史通义·史释》中曾经给

“档案”下过定义：

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

章学诚讲的是，档案乃各级衙门书吏掌管的文件，实际上体现了国家制度，乃自尧舜以来国家继承沿袭或变革更改、损失破坏或受益成功的实践活动记录。此乃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给“档案”下的定义。

近百年来，中外学者给“档案”下了形形色色的定义，这些定义涉及到档案的形成及形成原因和条件、价值和作用、保管期限、保管处所、物质形态及其属性等方面的内容。

目前比较权威的“档案”定义为：

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保存备查的文字、图像、声音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①

可以简单地概述为：“档案是原始的历史记录。”

档案的前身是文件，当文件已经使用完毕，丧失了时效，只有存档备查的功能了，便转化为档案。因而，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档案一旦解密，可以为学术研究和参考服务了，便成为史料的一种，即我们通常所称的“档案史料”。

（二）档案史料

档案史料的范围非常广泛，随着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不断丰富，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关于“档案史料”的观念也不断变化，档案史料的范围逐渐扩大。档案史料包括口碑档案、文物档案和文献档案三种。

1. 口碑档案

口碑档案主要指在出现文字之前，人们通过言传身授留下的传说、故事、轶闻等。远古时代，人类还没有创造文字，只能将发生的事情以口相授，彼此相告，用以交流思想、表达感情，世代相传，遂成口碑档案。所谓“十口相传为古”，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口碑档案的诞生，梁启超曾经形象地描述过：

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地，其族部之长老……纵谈己身或其先代们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则蟠踞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辗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②

口碑档案是以人的大脑为记载史事的载体，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及口耳相传的

^① 《档案学词典》，1版，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版，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